

【考辨】

“文革回忆录”可信度之我见 ——兼评《清华蒯大富》一书的失实

聂树人

现在，许多人在写“文革回忆录”，连当年整人的人，也有“文革回忆”大作问世。

写回忆录，也应该算是写“史”吧，应以真实为第一要务。不夸大，不缩小，更不编造。不过，事情过了几十年，“记忆”出来的东西，疏漏、不准确，也在所难免。

写回忆录，将自己骂一顿，可能没有人说话。而事涉他人，即使实事求是地写，也很为难。大抵是，只能说好，不能说不好。有些事，无所谓好坏，到了笔头之下，不得不写。可是，你一旦写出来，就可能惹出麻烦。因为，你觉得无所谓，可是，人家觉得有所谓。稍不注意，就要得罪人。要写，就不要怕得罪人。写一半，留一半；只写好听的，不写不好听的，不如不写。至于借写“回忆录”之名，毫无事实、毫无根据地吹捧自己，挞伐他人，更是要不得。

以下，仅以已出版的几本“回忆录”为例，看看“文革回忆录”的可信度。

一. 1966年“国庆观礼请柬”是谁发的

1、韩爱晶说，他上天安门请柬来自二司

据《清华蒯大富》一书的作者许爱晶说：

一次聚会，韩爱晶说：“1966年国庆节我已经上了天安门城楼了。我们北航‘红旗’属于二司。那个二司当时是个保守的，北航‘红旗’在里面是造反派。由于我们组织比较大，还是分给我们一张请柬，我代表北航‘红旗’上天安门参加国庆观礼活动。我们住进

中南海，白天上了天安门城楼，晚上在中南海岸边看焰火。”¹

2、蒯大富说，他上观礼台的请柬来自贺鹏飞

许爱晶在《清华蒯大富》一书中说：

韩爱晶问蒯大富：“你当时身为三司三人核心组成员，怎么过的国庆？”

蒯大富说：“他们肯定搞鬼了，他们没给我请柬。”

韩爱晶又问：“当时社会上认为你是三司司令，就算是三司的副司令，竟然没有拿到上天安门的请柬？”²

蒯大富说：“我是从清华拿的请柬，是贺鹏飞广播要我到的静斋，他说国庆有上观礼台的请柬，是贵宾台。说给我们清华有几张，几个组织平分，给了我两张。当时我们井冈山才成立一个星期，没多少人。贺鹏飞还是挺老实的，这就很简单。我和彭伟民一起去的。”³

这才是蒯大富的真心话，实情话。

贵宾台，即位于天安门城楼前（下）的观礼台。

可是，在许爱晶所写《清华蒯大富》的同一页，蒯大富又有另外的说法：

“那肯定是三司那边陈爱莲搞的鬼，他们为了自己去，就把我的请柬给贪污了。”

如果“三司那边”不“贪污”，蒯大富不是一个人就有了两张“观礼票”？

蒯大富当时和后来，并不是什么“大人物”，不过是众多同工作队作斗争的人士中的一员。只因为王光美是清华工作队中的一员，他才引起中央的重视。而1966年8月至9月，引起中央重视的人并不只是蒯大富，还有很多。况且，即使他引起中央重视，他也“扶不起来”，还是众多“反革命”中的一员。以这样的身份，还幻想中央从“两个方面”给他送“观礼请柬”，蒯大富将自己估计得也太高了。

我已经在互联网上，在《三司与〈首都红卫兵〉》一书中，指出，蒯大富既不是三司

¹ 许爱晶：《清华蒯大富》，第141页，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2011。

² 同上，第141页，陈爱莲当时是三司组织部工作人员。

³ 同上，第141页。

司令，也不是“三人核心组成员”，更不是“三司的副司令”。三司自成立到结束，根本就没有“司令”这一设置。“蒯司令”，主要是蒯大富自己的炒作，当然也有他人的以讹传讹。这一点，在2000年以后，是连蒯大富本人都承认的。韩爱晶在《清华蒯大富》一书中，也是认可的：

“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核心人物聂树人有篇文章《蒯大富不是‘三司’司令》，蒯大富的说法与聂树人文章中宋永毅采访朱成昭得到的回答相吻合。”¹

可是，到了21世纪，韩爱晶还是要装糊涂，一再这样发问；蒯大富还想继续炒作，而硬要往“蒯司令”这边靠。

3、王大宾说，他上天安门的请柬来自国务院

《王大宾回忆录》出版了，可喜可贺。在回忆录中，王大宾对于他上天安门，“很不理解”。《王大宾回忆录》第107页第四大段第5节的标题是：“我不知道，周总理、中央文革为何选中了我”。

该节的正文说：1966年9月27日，我在地院接到参加国庆日庆典活动的大红请柬。请柬上直接写着邀请王大宾的名字，下面盖着国务院的大印。接到请柬，我就觉得不安，认为不妥，地院东方红的第一把手是朱成昭呀，请柬应该发给他才对。我马上找到朱成昭，对他说：“你是东方红的一把手，这个请柬应该给你，应该你去参加。”朱成昭说：“这是国庆日庆祝活动筹备组吴德、丁国钰和周总理他们商定的名单，既然邀请你你就代表我们东方红去参加吧。写的是你的名字，还是你去的好。这样的活动，我今后有的是机会。”

“9月27日晚，我按请柬的要求报到后，被安排入住中南海。这时才知道，同到的还有师大的谭厚兰、北大的聂元梓、北航的韩爱晶。后来听说请柬也发给了清华的蒯大富，但被清华文革的贺鹏飞、刘涛扣下了，因而蒯大富就错过了参加这一活动的机会……”

“这次国庆日庆祝活动，对北京高校保工作组的保守派组织与反工作组的造反派组织，还是被一视同仁、平等对待的。我们地院已变成少数派的保守组织‘斗批改兵团’红卫兵

¹ 同上，第136—137页。

头头中的一个女同学，也同样受到邀请参加了活动……”

4、聂树人说，“他”上天安门请柬来自三司



1966年10月1日，我也上了天安门。在我2013年出版的回忆录《三司与〈首都红卫兵〉》¹一书中，已经描述了经过。现将该描述抄录（个别地方作了点修改）如下。

10月1日，我作为三司代表，与王大宾等进入中南海，上天安门，参加了国庆节庆祝活动。时间7天。我进中南海那天是9月30日下午。记得，刚进去时，心情激动，因为，我们已经到了中国最高领袖居住、

（上图：我的入席证的正面）生活和工作的地方，到了中国的核心。但是，从房子的外表上说，中南海的建筑与外面没有什么两样，大都是一层建筑，破在其次，旧，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一次，一共进来了约1000名红卫兵，其中，北京的，都是三个红卫兵司令部指派的。

那时，形势发展还很不明朗，以“三司”为代表的造反派势力还不强大。因此，在由三个司令部指派的上天安门的人中，以一司和二司的人数居多。



（上图：我的入席证的背面）²

我们可以沿中南海的西缘北段随便走。往南，因为没有走，也不知是否走得通。刚进中南海时，就宣布有纪律，要服从命令听指挥，在指定的区域活动，不要乱走。

晚上，安排看露天电影。在电影开始前，江青接见大家。江青说是来看望大家，问大家吃得好不好，住得好不好。要说吃的，因为人多，就是大锅饭，大锅菜，不过那米却是地道的“小站米”，很好吃，我们以前极少吃的。菜虽然是大锅菜，但是，比起学校食堂里的大锅菜，比起劳动人民文化宫食堂里的大锅菜，“内容上”要好得多。住的，是“郎

¹ 聂树人：《三司与〈首都红卫兵〉》，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3年。

² 入席证上面的姓名一栏原是空的，“聂树人”三字是我自己填写的。盖的大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周年筹备委员会”。我在上面写的是：“1966年9月30日，乘（凭）此出席证进中南海，十月一日登上天安门城楼，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

当铺”，和外面差不多，只是“挤”的程度不如外面。

第二天一大早，吃完饭就准备上天安门。事前，好像周总理给我们交代过，不许与毛泽东握手，因为那么多人，一个一个与毛泽东握手，毛泽东受不了。

到了天安门城楼上，我们先是站在东边城楼。等到长安街上游行开始一段时间后，才放我们过去，由东往西，依次经过天安门城楼。到天安门城楼正中时才看到，毛泽东就站在楼门前的台阶上，向大家招手致意。刘少奇站在毛泽东身后偏左的高一级台阶上，手中拿着毛主席语录本摇着。我们遵照周总理的指示，没有上前同毛泽东握手。大家都口中喊着“毛主席万岁”，手中举着毛主席语录，按顺序走过去。

后来听说，我们三司曾经有个别人上前，同毛主席握过手。

不久，我们就又站在天安门城楼的西边了。

在城楼西边，我们居高临下，看到天安门广场上密密鸦鸦的人群在慢慢地通过。由是，我想到了我们站在城楼上的人的幸福。

离开天安门城楼后，我们又排着队回到中南海里面。按照刚进入中南海时的编制，大家在一起学习林彪、周恩来在庆祝大会上的讲话。还自由活动，在中南海进行了参观。

在中南海北门附近的小广场上，有人曾摘下几片冬青叶子，夹在语录本中，以作进中南海的永久纪念。

晚上，还是看电影。

后来，我们离开中南海往北，进入一个大院。那大院好像是国防部机关，我们就是在那里照了一个“全员相”。参加照相的，只有周恩来及其以下的中央领导人叶剑英、陶铸、康生、李先念、李富春、江青、谭震林、陈毅、肖华、关锋、戚本禹、杨成武，没有毛泽东，也没有林彪。



上图：周总理等接见红卫兵的照片（片断）

照片是由“轮转机”照的，约有一米长。我和王大宾站在偏右的位置。



上图：周总理等接见红卫兵的照片（放大片断）

后排右起第九人是王大宾，由下往上数第四排右起第八位是我。

1966年10月1日前夕，蒯大富刚刚从泥淖中爬出，他在三司原本什么都不是，谁会送给他上天安门的观礼票？

5、国庆观礼“请柬”的发放渠道

韩爱晶明确，“观礼请柬”来源是二司。

蒯大富是从贺鹏飞手中得到，而贺的来源渠道，该书没有说。可以肯定的是，贺手中还有其他请柬，估计来自一司。至于王大宾说的“后来听说请柬也发给了清华的蒯大富，但被清华文革的贺鹏飞、刘涛扣下了，因而蒯大富就错过了参加这一活动的机会。”应该是王大宾“听”错了。因为蒯大富虽然没有上天安门，却是上了观礼台的。

我的请柬肯定来自于三司，我当时就在三司工作。请柬上也没有写名字，“聂树人”三字是周永璋将请柬发给我后，由我自己填写上去的。当时，上级分配给三司的“观礼票”有几十张，其中，有好几张是上天安门的，其他都是上观礼台的。除三司机关外，大都分配给了三司下属院校。

王大宾说他的请柬来自国务院，“请柬上直接写着邀请王大宾的名字，下面盖着国务院的大印”。这样看来，他的请柬与我的请柬不是一回事儿，或者，是他记错了。

从《王大宾回忆录》中的这段话“这次国庆日庆祝活动，对北京高校保工作组的保守派组织与反工作组的造反派组织，还是被一视同仁、平等对待的。我们地院已变成少数派的保守组织‘斗批改兵团’红卫兵头头中的一个女同学，也同样受到邀请参加了活动……”似乎又觉得，王大宾上天安门的请柬，与那个女同学的请柬，是“一视同仁、平等对待”的，“邀请渠道”是统一的。那个“女同学”不可能是周总理、中央文革“选中”而邀请的，她的请柬，肯定是“一司”发给的，因为地质学院保守派红卫兵参加的是“一司”。

我和王大宾，还有其他上千人，是在一起活动的。对于我上天安门这件事，在21世纪，我曾同王大宾说起过。可是，王大宾不记得，甚至不相信。不过，我保留的当年上天安门的“入席证”可以为证；我和他在一起的合影，可以证明我说的是真话。话又说回来，文革初期，彼此认识，但是，却从没有在一起工作过，不熟悉，是实情。

1966年国庆节观礼请柬的分配，已经不能靠北京市委、市政府了，因为它们都瘫痪了。此时，北京高校已经成立了三个红卫兵司令部，中学也成立有跨校的红卫兵组织。因此，国庆观礼请柬就通过红卫兵的这几个“超级组织”顺利分配下去了。

就是“国庆观礼请柬”这样一件具体的小事，四个人的“回忆”却颇有不同。是“记忆”有误，还是“另有原因”？

二. 韩爱晶是如何“分身”的？

蒯大富在9月6日，还是东躲西藏的“光杆”一个。在以朱成昭为首的“地质东方红”的支持下，于1966年9月24日，才成立了“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许爱晶在《清华蒯大富》一书中，首先是蒯大富说：

当时朱成昭、韩爱晶支持我。我们成立井冈山的时候一百人还不到。他们地质“东方红”和北航“红旗”早就队伍雄壮，北航“红旗”已有近两千人。我们“井冈山”红卫兵在大礼堂开成立大会，大礼堂座位一千四，朱成昭带着地质“东方红战士”，韩爱晶带着北航“红旗”战士来到礼堂，坐在会场上撑场面还有一些上地院来串联的，会场也差不多坐满了。¹

时间、地点都有了。连礼堂能坐一千四，“差不多坐满了”这类细节，都记得清清楚楚，确确实实。谁还能不信呢？

可是，在同一本书里，下面的话又在同韩爱晶打架。韩爱晶说，“北航红旗”成立于1966年8月20日：“我们实行巴黎公社全面选举制……每个系推荐两个人到院里来，加上老师和工人代表差不多20个人，形成核心。我只是这个核心成员之一……一切活动都要

¹ 许爱晶，《清华蒯大富》，第139页。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2011。

充分发扬民主。”¹

韩爱晶又说，在10月4日以前，“石兴国是主持全面的。我在校外、在国防科委门口负责那里的斗争……直到10月4号，我们北航红旗翻身了，又搞了一次普选，才产生五个常委……这时才明确我为一把手。但决定重大问题都要召开大会、小会、全体战士会，凡事少数服从多数。”²

这就是说，韩爱晶带大量人马去清华大学支持蒯大富，根本不可能。

(1) 时间上不允许。自8月25日始，韩爱晶作为“前线负责人”，到国防科委门口，坚持了28昼夜，去“揪”工作队负责人了。到9月21日，才结束回校。而9月21日以前，韩爱晶不可能分身，既在国防科委门口，又到清华大学去同蒯大富联系。即使他回到学校后，在短短的两天时间（9月22—23日）里，工作队负责人还要作检查，他又是如何同蒯大富相识相知，而于9月24日带领大队人马，去的清华大学？

(2) 领导体制不允许。在1966年10月4日前，“北航红旗”实行的是“20个人”的“核心”集体领导，能允许“只是这个核心成员之一”的韩爱晶带大队人马去清华支持蒯大富吗？况且，自“北航红旗”成立到9月底，工作队加于造反派头上的“右派一反革命”帽子还没有摘除，自己的问题都没有解决，哪里有余力，如“地质东方红”那样去管别人的事情？当时，北航的情况与地质学院的情况相差较大，“地质东方红”不仅于8月24日将工作队的主要派出者何长工等“请”到了地质学院，还通过“8.24大辩论”，基本上打垮了保守派。

因此，说“北航红旗”在1966年9月，如何如何支持蒯大富，难以令人相信；说韩爱晶带领大队人马到清华大学的“大礼堂”，去支持蒯大富，根本不可能。

三. 许爱晶打扮“三司”一例

¹ 同上，第140-141页。

² 许爱晶：《清华蒯大富》，第141页，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2011。

在我的“厘定”下，“蒯司令”是当不成了。¹许爱晶在他“编著”的《清华蒯大富》一书中，给蒯大富的另一个身份——“三人核心小组”成员。他借用蒯大富的口说：“……我当时没有队伍，朱成昭特别邀请我以个人名义参加，并要我参加三人核心小组……”²他说，“三人核心小组另一个人是北京外语学院红旗大队负责人宋远利”。还附上了蒯大富与宋远利在21世纪在一起的照片。可是，照片下的文字说明却是“与三司副司令宋远利重逢”。一会是“核心小组”的成员，一会又成了“副司令”，许爱晶的逻辑好像出了点问题。

宋远利不是北京外语学院“红旗大队”的一把手，即主要负责人。这是可以肯定的。他只是“红旗大队”派驻三司的代表。

蒯大富好与名人照相、拉关系。许爱晶在写《清华蒯大富》时，可能也深受感染。可能的情况是，当他看到蒯大富与宋远利的照片时，或者胡乱地给蒯大富和宋远利加上了什么“三人核心组”的头衔，或者觉得，蒯大富向来只与名人来往，宋远利在当时名气不大，而且一个多月后即离开了三司，因此，就立即又给他加封了“副司令”的称号。

是许爱晶对三司过于热爱，还是过于仇恨，他不断地往三司头上贴红贴黑……

如果宋远利看到这些文字，他有何感想？是承认自己是三司“三人核心组”成员呢，还是承认自己是三司“副司令”呢？还是原本就什么都不是？在文革被“彻底否定”的政治背景下，在21世纪，抢这样一顶帽子戴在头上，也不见得是好事。

四. 许爱晶编造蒯大富领读“誓词”

在《清华蒯大富》的另一个地方，许爱晶又借蒯大富之口说：……大会会有一个议程，就是带领全场十万人宣誓，稿子是韩爱晶准备好的，韩爱晶把稿子递到我手上，对我说：“蒯大富，你来念吧。”

¹ 详见我发表在互联网上的有关文章及我写的《三司与〈首都红卫兵〉》一书。

² 许爱晶：《清华蒯大富》，第136页，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2011。

许爱晶说：“会议最后一个议程是宣誓。会前准备好的誓词在我手上，我觉得井然代表北航“红旗”发言已经很成功啦，我再领誓，北航占得太多不好。蒯大富坐在我旁边。我一想，周总理虽然在清华给蒯大富平反，但他好像还是挺臭的，成立个“井冈山”还不到一百人。让他上去，批反动路线意义更大。我就把稿子递给蒯大富，我说：“誓词你来念吧！”蒯大富接过稿子就上前去了。

因为参加这个大会的人员，相当数量是外地来京的造反派，都以为是中央首长让三司令蒯大富领誓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会在北京和全国造成极大影响，掀起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¹

“从此，蒯大富个人在清华大学校内政治处境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全国也产生了影响。”²

我对此的评价是，许爱晶写的蒯大富，韩爱晶的回忆，不仅错了！而且错得离奇！！

首先，韩爱晶将时间搞错了，蒯大富带领大家宣读誓词，是在1966年的9月6日，而不是10月6日；其次，是在三司成立的大会上，而不是“誓师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的10月6日大会上；第三，是在北京工人体育馆，而不是在北京工人体育场。

在当时的情况下，只是在一个组织成立时，才宣读誓词的。在召开批判会时，是不宣读誓词的。10月6日的大会是“誓师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大会”，不可能宣读誓词。这个常识，写“五大领袖”蒯大富的许爱晶难道不知道？

韩爱晶本不是三司的人，他怎么可能参加9月6日三司的成立大会，并把蒯大富“推上去”宣读誓词呢？在三司成立大会上，张春桥、江青等根本就没有到场，蒯大富又怎么能见到他们呢？

“稿子是韩爱晶准备好的。”蒯大富是否说过这话，只有他们两人知道。

显然，出于制造北航与三司“联合召开10月6日大会”的需要，就必然需要“回忆错

¹ 许爱晶，《清华蒯大富》，第144页。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2011。

² 同上，第145页。

位”。

但是，由于“回忆错位”，无论是蒯大富，还是韩爱晶，就不能自圆其说了，许爱晶说，蒯大富因为参加了10月6日大会，“从此，蒯大富个人在清华大学校内政治处境也发生了重大变化。”¹如果这是真的，那么，请蒯大富自己说说，他的政治处境发生“重大变化”，是在9月6日以后，还是10月6日之后？

至少，蒯大富应该回答，“清华井冈山红卫兵”是不是9月24日成立的。如果是，那么请问许爱晶，在1966年9月，都拉起了自己的队伍了，贺鹏飞都要给发“国庆观礼”的请柬了，还说，在校内“政治处境”没有发生变化，或发生重大变化；直到“参加”了10月6日大会，才“发生了重大变化”，这说得过去吗？

五. 许爱晶要“厘定”什么？

1966年10月6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的由三司主持的大会，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文革转折的一次大会。

21世纪之初，北航红旗“有人”（是谁？）回忆说，这次大会是他们和三司“联合召开”的。这算是“投石问路”。

后来，由蒯大富口述的《流沙岁月》（很可能，它不是蒯大富执笔的）中，又做了“联合召开”的“回忆”。该文借用蒯大富之口：“10月6号的大会我参加了，韩爱晶把我推上去念那个大会誓言。这次会上呢，张春桥看见我说：蒯大富，过来过来。他把我拉到主席台另一边，介绍给江青，说江青同志，这就是蒯大富。江青说，你就是蒯大富啊？这是第一次见江青，也没说什么话，等于打一个招呼。”

蒯大富、韩爱晶根本就没有参加1966年在工人体育场召开的10月6日大会。这次大会是由三司主持召开的，我当时就坐在主席台上，根本就没有见到蒯大富、韩爱晶。²

¹ 同上，第145页。

² 聂树人，《三司与〈首都红卫兵〉》，第57页。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1。

但2011年，许爱晶在《清华蒯大富》一书中，要“厘清十万人大会前后重要史实”了：

“蒯大富回忆说：1966年10月6号大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大会，在北京市绝对是一个划时代的大会……北航和三司共同筹备的。地质周永璋坐主席台。在工人体育场，坐满十万人。”¹

韩爱晶回忆说：“……1966年10月6日，北航“红旗”和首都“三司”在工人体育场共同组织了一个十万人大会。当时“三司”主要负责人朱成昭派人和我们一起做组织工作，但他想不到会议开得那么隆重，那么成功。会议程序、发言、誓词，请中央领导等，这些环节，主要是我们北航“红旗”落实的。

“准备工作只有几天，我、井然(文化革命时原名井冈山)和姜允珍同学在办公室起草发言稿、誓词等，五系张庆海等做了请柬，写明请周总理、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中央首长。我们拿着请柬就打电话联系《解放军报》一个叫宋立彤的记者，他非常重视。他向《解放军报》领导汇报了我们开大会的事，宋立彤和《解放车报》的负责人开小车专门来北航听取我们关于召开十万人大会的情况汇报。他们满口答应，说一定尽最大努力帮助请中央首长。

“10月6号，我和井然提前赶到工人体育场，北航“红旗”战士都安排在离主席台正面最近的位置。看着会场很快就座满了十万人，心里又高兴又紧张不安、高兴的是会场很热烈，大会基本可以成功啦！紧张的是，中央领导会不会来呢？”

“忽然掌声四起，周恩来、江青、陈伯达、康生、谢富治、杨成武和张春桥等笑容满面，一边高举双手面向会场鼓掌，一边走到主席台坐下。

“大会开始，北航“红旗”代表井然第一个发言，他那超宏亮的声音和充满革命豪情的发言，激起全场热烈掌声，周总理等频频微笑点头。后来陈伯达、江青只讲了几句话，

¹ 许爱晶，《清华井冈山》，第141页。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2011。

张春桥宣读《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重点是周总理讲话。”¹

你看，本是局外人的韩爱晶，没有参加大会的蒯大富，对“北航和三司”共同筹备10月6日大会这件事，情节写得多么详细！时间、地点写得多么准确，参加的人有名有姓，场景是多么宏大，会议开得多么有声有色！

可是，我要说，除过“北航红旗”的那个叫井冈山的人在大会上发言这件事情是事实外，其它都是不存在的！这是韩爱晶、蒯大富的一次不成功的合作，是又一次“记忆错位”。在《三司与〈首都红卫兵〉》²一书中，我共列出十条根据予以驳斥：

第一，毛泽东一直在寻找文革的依靠力量。经过两个多月的选择，最后选中了弱小的三司（当时只有3000多人）。1966年10月6日，毛泽东派周总理以及其它中央领导参加大会，一是支持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批判，二是对大会的主持者三司以强烈的支持。大会以后，三司很快发展壮大。

其次，三司，是中央承认的三个红卫兵司令部之一，是一个“超级群众组织”。而北航红旗，只不过是一个参加了二司的群众组织。一个次一级的群众组织“北航红旗”和一个高一级的“超级组织”三司“联合”搞活动，是不对等的。因此，是不成立的，“联合”召开大会，根本不可能发生。这是常识！另外，韩爱晶是在1966年9月29日，在戴维堤的谦让下，才拿上了上天安门门的“请柬”，并在中南海呆了近一星期。³他如何“筹备”这个紧接国庆节的大会？韩爱晶自己也说：他是1966年10月4日才当上“北航红旗”的第一把手的。当第一把手，屁股还没有坐热，他如何能时隔一天，就与朱成昭联系筹备召开10月6日大会？

第三，以朱成昭的“刚愎自用”，根本不可能去找尚在参加国庆观礼的、尚不是“北航红旗”第一把手的韩爱晶商谈“联合”召开大会的事情。

¹ 许爱晶，《清华井冈山》，第143页。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2011。

² 聂树人，《三司与〈首都红卫兵〉》，第33—34页，第58—66页。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3。

³ 见互联网，戴维堤的有关回忆。

第四，在工人体育场召开十万人大会，毕竟不是一件小事，得提前好几天成立会议筹备组。这些，都与“北航红旗”没有半点关系。按照韩爱晶所写，如此重要的大会，却成了他在“北航红旗”办公室决定的事情，他还能在大会上颐指气使，岂不可笑！

第五，到1966年9月中下旬，三司已经与中央文革小组建立了非常密切的关系。根本用不着“北航红旗”通过《解放军报》去探询（韩爱晶语）。

第六，10月6日大会，朱成昭根本就没有到会。如果是“联合召开”，按照“北航红旗”以及韩爱晶的特点，它必然要在大会上占有一个主持大会的席位，至少，它会争得在大会上“露脸”的其他角色。可是，大会自始至终，除过井冈山发言外，人们在主席台上，看到过“北航红旗”人的影子吗？

第七，在10月6日以前，三司还是一个只有三千多人（“地质东方红”就占了一半多人）的小司令部，既没有权，更没有势。周总理在9月26日接见三司全体战士时，还在说着不要怕自己是“少数派”的话。在这种情况下，“北航红旗”负责人、当时还不是第一把手的韩爱晶，能与三司“联合召开”这次会议？当然，北航红旗的负责人不能不知道二司的保守派真相。因此，脚踩二司，伸手三司，就成为他们权变的另一着。你三司要召开大会，邀请我，我写个稿子到大会上去念念，有何不可！而且，还可以在三司造反派主持的会议上展示我造反派的雄姿！

第八，“北航红旗”不以二司的名义在社会上活动，是不忠诚于自己组织的表现，是对二司的背叛，在当时是一个令人鄙视的投机行动，很令人不屑！

第九，在这样的大会上，不可能“宣读誓词”。韩爱晶“煞有介事”地说，他临时起意，让蒯大富宣读誓词，又从何说起？一个有中央领导人参加的会议，有严格的会议议程、会议安排，岂是在会议召开过程中，可以随意改变的？！退一步说，难道“联合召开”的会议，就由韩爱晶一人“临时起意”，随意说了算？

第十，当时及以后，几十年来，人们都知道10月6日工人体育场大会是由三司主持召开的，这是没有任何疑义的。韩爱晶“厘清”的词儿一出现，就露出了他的心虚。

此外，在书中，我还引用了三司当时的参谋长路瑞宗的话¹：10月6日的“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誓师大会”是由三司发起，邀请当时在北京的一些造反派组织参加，包括在北京的外地革命群众组织。北航只是我们邀请的单位。其实，当时无论韩爱晶还是蒯大富都没有那么大号召力……老蒯的被解放，是由于我们“地质东方红”两次去清华，大张旗鼓地支持他，贴大标语、演说等等，这样才一点一点的把他从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下解放出来。他在外面的名声大，是因为他给当时的工作队长叶林（时任国家大计委的副主任）的42封公开信。

在《三司与〈首都红卫兵〉》一书中我还写道：10月9日《首都红卫兵》报对10月6日大会的报导：“在大会上发言的代表有，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广西桂林师范学院等全国各地十多个单位。”这里，没有写“地质东方红”代表的发言，也没有写清华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代表陈育延的发言。那原因没有别的，就是因为“地质东方红”和“清华毛泽东红卫兵”属于三司，是大会的主人，而不是如“北航红旗”和“桂林师范学院等全国各地十多个单位”是“外人”。因此，不能因为“北航红旗”的井冈山（后改名井然）在大会上发了言，就被说成是三司与“北航红旗”联合召开的大会；更不能说，因为“桂林师范学院等全国各地十多个单位”在大会上发了言，就被说成是三司与“桂林师范学院等全国各地十多个单位”联合召开的大会。

我现在要补充的一点是，韩爱晶说他到会后“紧张的是，中央领导会不会来呢？”我想告诉韩爱晶的是，不用他在21世纪“担心”。在我们心里，中央首长肯定会来的。我这样说的依据是，10月5日下午，中央文革办公室的张根成急急来到三司，说我们送给中央首长的请柬不够，还要再送三个人。于是，很快就又补了三个人的请柬。即使开会前中央首长未到，我们也不担心——他们肯定会来的！事实是，中央首长是在开会前就到了的。韩爱晶的编造没有根据。这样一来，韩爱晶的如下回忆将成笑料：

¹ 路瑞宗现在河北廊坊。

准备工作只有几天，我、井然(文化革命时原名井冈山)和姜允珍同学在办公室起草发言稿、誓词等，五系张庆海等做了请柬，写明请周总理、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中央首长。我们拿着请柬就打电话联系《解放军报》一个叫宋立彤的记者，他非常重视。他向《解放军报》领导汇报了我们开大会的事，宋立彤和《解放军报》的负责人开小车专门来北航听取我们关于召开十万人大会的情况汇报。他们满口答应，说一定尽最大努力帮助请中央首长。

六. 如何看待“文革回忆录”

已经出版的“文革回忆录”“可信度”是大打折扣的。对此，我的看法是：

1、可信者：其中的事实，有原始证据、原始出处，当年就没有疑问的事情，给“可信”评价。

2、较可信者：虽然没有原始证据或出处，但事件“公知”，个人在事件中有特殊贡献、特殊经历的，给“较可信”评价。

3、较存疑者：事件“公知”，但个人的经历，发生的时间、地点不详，没有旁证，或旁证可疑，给“较存疑”评价。

4、存疑者：没有原始证据或出处，仅凭残留的印象。即使细节说得再仔细、再具体、再确切，也只能给予“存疑”的评价。

5、难以相信者：以“笔名”写的“回忆录”（权且如此称之），如许爱晶写的《清华崩大富》之类的书，只可以当小说或其他作品来读。

“姑妄听之”者：作者的年龄，比如当年只是几岁、十几岁的小学生、中学生，或者尚没有出生者，仅凭个人的经历或“上辈人”的“言传”或其他，写出的貌似“回忆录”的作品，给予“姑妄听之”的评价。■